

■ 好书共赏

早在1928年吴金鼎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后,龙山文化即引人注目,与仰韶文化齐名,成为研究中国远古时代的著名的考古学文化。近百年来,海岱地区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有关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古代文明化进程、多学科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各项研究工作,均取得一系列进展,从而使海岱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重要文化区之一。与此同时,先后涌现出数代考古学人,不断奉献出优秀学术成果,谱写海岱考古的壮丽篇章。其中,何德亮先生的大作《何德亮考古文集》上下两册即是最新出版的海岱考古成果之一。该书从作者1985~2022年间撰写的100余篇学术论文中精选33篇,其内容大体由三类文章所组成。

第一类是山东新石器时代各时段考古学文化研究专论。

这一部分的文章,主要涉及对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探讨。特别是对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根据考古发掘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分别对栖霞杨家圈、枣庄建新、滕州西公桥、兖州西吴寺、兖州六里井、济宁程子崖、潍坊前埠下等遗址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面貌特征、年代与分期、文化性质、地方类型,还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商品交换、彩陶艺术、打击乐器(陶鼓)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精彩分析,让人不禁为之叫好。

第二类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专题研究。《何德亮考古文集》的一系列文章当中,如《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相关问题探讨》《海岱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等文章,对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同周围地区同时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也进行梳理,从纵横关系与时空框架等多方面做了对比分析,理清了各自地区不同文化间的源流与发展脉络。再如《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初论》《山东史前玉器初探》《山东史前时期的陶塑艺术》《山东史前乐器初探》等文,对山东地区史前文化中的原始农业、自然环境、史前玉器、陶塑艺术、早期铜器、宗教祭祀、古代乐器、史前战争等进行了专题研究。特别是对原始农业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关系,家畜饲养业、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冶铜术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兴起、聚落形态的发展与递变、社会内部分层与分化、遗址群的分布、金字塔式中心聚落的产生、墓葬制度的演化等均做了系统论述。

第三类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中外学术界迄今未能达成统一认识。通常国外学者大都把城市、青铜器和文字作为文明标志或文明三要素。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国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将文明归纳为国家、城市、文字和金属冶炼。

自近代科学及科学体系传入中国,科学所建起的规范深刻影响着学术界。自然科学更强调范式,不仅是研究的步骤,还在科研成果产出层面有突出特征:实验报告、数据、摘要、结论,每一个经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被这种格式所“驯化”着。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形式,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课本,一二三四,我们早已熟悉这种叙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基本是单向的,最多在每一章的最后附上问题,以这种形式形成互动机制,还鲜有以对话形式编著的讲理论的书。而一谈到理论,这个词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就往往意味着好像要被“束之高阁”,离我们的距离很远,它是晦涩的,难懂的,它需要联系实际,那就更别说考古学理论了。对于从事考古学专业学习与研究的人群而言,考古学理论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考古学最接近历史学科,自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寻求独立,自然就存在二级学科的设置。有意思的是,考古学的二级学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可现实是,学科内部有多少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谁又会以我是理论研究者自居?

可以肯定的是考古学需要理论,我们都不会否认理论的重要性,进而想知道都有哪些理论,又如何理解与运用呢。近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显然作者在内容铺陈上做了用心安排。

第一讲首谈什么是考古学理论作为引导,更多是抛出问题,什么是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是科学吗?接着第二、三讲关于文化历史考古学,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考古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拥有自身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考古学最早接触并运用最为广泛的研究范式。之后第四讲则将“什么是考古材料”单独讨论,这并不是说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下没有这个前提,而是接下来发展出的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都是对什么是考古材料这一看似不需要再讨论的内容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过程考古学强调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强调文化是超机体的适应方式,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从而确立了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同样第五讲的后过程考古学也一样,它所指的文化又是更为抽象的,赋予意义的,且具有“反身”性质的(详见书中内容及作者《考古学的最好理解》)。在历数前面的三大范式后,第七讲“创造属于自己的阐释”,则是作者站在中国考古学本位的思考。之后的第八讲能动性,第九讲景观,第十讲物质性,第十一讲进化论,第十二讲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当代考古学的所谓八大范式(详见作者《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范式述评》),以上的内容作者或多或少地系统介绍过,或有亲身实践性的研究,本书通俗易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是对那些学术论文的最好注解,与之结合着阅读能够达到“既知晓又理解”的效果。书中把考古学所处当代社会的现实关联放在了最后几讲。第十三讲古典历史考古学,包括联代考古学形成前的西方的古物学以及中国的金石学。这部分内容按照学科发展历程本该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出现之前来介绍,显然作者打乱了顺序,将之落在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上,旨在重新评估金石学及其意义,在“追三代之遗风”之外讨论“物以载道”的问题,力图“寻找中国的古典考古”。第十四讲社会考古中讨论的身份、性别等新兴话题,与现实关联很强,可以看到强烈的“内史”和“外史”倾向,

## 海岱之花

——喜读《何德亮考古文集》

赵青

##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考古理论普及

李彬森

何德亮先生认为阶级的产生,就是文明时代的开端。进而昭示,社会财富占有不平等以及阶级和等级分化等均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说明已经产生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这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即是国家的诞生。如恩格斯所言,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何德亮先生强调,必须从生产的发展开始研究,然后再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通盘考察,同时利用考古学有关资料,从多领域、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就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判断与研究,并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路径与渐变过程及对古代文明起源进行全面诠释,才能揭示清楚我国古代文明起源漫长的发展进程。深入研究其各自之间的内在变化规律,才能在探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何德亮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他结合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国海岱地区的考古实践得出的真知灼见,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当然,何德亮先生在海岱考古研究中取得的成绩,还远不止考古文集中所提及者,如果再把何德亮先生撰写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起拿来阅读,定会取得更为全面的认识。不过这部《何德亮考古文集》,已大体上能够代表何德亮先生关于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所识所想。这部著作,特别辟有“论著索引”,便于读者查阅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何德亮先生不仅主编或合编了九部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如《兖州西吴寺》《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兖州六里井》《昌邑辛置——2010-2013年墓葬发掘报告》等,做到了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双丰收。此外,何德亮先生长期担任《海岱考古》辑刊主编或执行主编,为及时刊发海岱地区的考古成果,作出默默无闻的贡献。

总之,《何德亮考古文集》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好书,特此向学术界积极推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何德亮考古文集》  
作者:何德亮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即学科内部演进逻辑与社会外部思潮的互动关系。第十五讲聚焦于大学教育的人都把这种格式所“驯化”着。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形式,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课本,一二三四,我们早已熟悉这种叙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基本是单向的,最多在每一章的最后附上问题,以这种形式形成互动机制,还鲜有以对话形式编著的讲理论的书。而一谈到理论,这个词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就往往意味着好像要被“束之高阁”,离我们的距离很远,它是晦涩的,难懂的,它需要联系实际,那就更别说考古学理论了。对于从事考古学专业学习与研究的人群而言,考古学理论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考古学最接近历史学科,自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寻求独立,自然就存在二级学科的设置。有意思的是,考古学的二级学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可现实是,学科内部有多少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谁又会以我是理论研究者自居?

可以肯定的是考古学需要理论,我们都不会否认理论的重要性,进而想知道都有哪些理论,又如何理解与运用呢。近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显然作者在内容铺陈上做了用心安排。第一讲首谈什么是考古学理论作为引导,更多是抛出问题,什么是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是科学吗?接着第二、三讲关于文化历史考古学,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考古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拥有自身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考古学最早接触并运用最为广泛的研究范式。之后第四讲则将“什么是考古材料”单独讨论,这并不是说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下没有这个前提,而是接下来发展出的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都是对什么是考古材料这一看似不需要再讨论的内容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过程考古学强调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强调文化是超机体的适应方式,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从而确立了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同样第五讲的后过程考古学也一样,它所指的文化又是更为抽象的,赋予意义的,且具有“反身”性质的(详见书中内容及作者《考古学的最好理解》)。在历数前面的三大范式后,第七讲“创造属于自己的阐释”,则是作者站在中国考古学本位的思考。之后的第八讲能动性,第九讲景观,第十讲物质性,第十一讲进化论,第十二讲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当代考古学的所谓八大范式(详见作者《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范式述评》),以上的内容作者或多或少地系统介绍过,或有亲身实践性的研究,本书通俗易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是对那些学术论文的最好注解,与之结合着阅读能够达到“既知晓又理解”的效果。书中把考古学所处当代社会的现实关联放在了最后几讲。第十三讲古典历史考古学,包括联代考古学形成前的西方的古物学以及中国的金石学。这部分内容按照学科发展历程本该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出现之前来介绍,显然作者打乱了顺序,将之落在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上,旨在重新评估金石学及其意义,在“追三代之遗风”之外讨论“物以载道”的问题,力图“寻找中国的古典考古”。第十四讲社会考古中讨论的身份、性别等新兴话题,与现实关联很强,可以看到强烈的“内史”和“外史”倾向,

即学科内部演进逻辑与社会外部思潮的互动关系。第十五讲聚焦于大学教育的人都把这种格式所“驯化”着。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形式,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课本,一二三四,我们早已熟悉这种叙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基本是单向的,最多在每一章的最后附上问题,以这种形式形成互动机制,还鲜有以对话形式编著的讲理论的书。而一谈到理论,这个词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就往往意味着好像要被“束之高阁”,离我们的距离很远,它是晦涩的,难懂的,它需要联系实际,那就更别说考古学理论了。对于从事考古学专业学习与研究的人群而言,考古学理论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考古学最接近历史学科,自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寻求独立,自然就存在二级学科的设置。有意思的是,考古学的二级学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可现实是,学科内部有多少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谁又会以我是理论研究者自居?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  
作者:陈胜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5月

■ 作者心语

2025年3月1日,历经多次修订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中国文物保护法治建设领域的里程碑。2025年,也是我从吉林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毕业,进入考古系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的第30个年头。值此之际,我对自己多年来陆续发表的教学、科研和学习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以《大保护:文物科技与人文的交互对话》为名结集出版。

从吉林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本科毕业留校,进入考古系文物陈列室(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前身)工作,到师从林云先生攻读古文字方向硕士,再到跟随北大吴小红先生攻读科技考古方向博士,构建了我文理贯通的知识背景。文物保护是典型的文理工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其研究特点也带有复合性及综合性,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多领域合作共同攻坚克难,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点从本书的布局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文物科技与探秘,包含两章内容,第一章为检测技术前沿与创新,第二章为材料分析与工艺解密。下篇文物保护与阐释,也包含两章内容,第三章为文物保护修复方法论,第四章为考古阐释与历史重构。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里面最强调材料证据及多学科合作的交叉学科之一,其学术传统注重资料整理、时空观察、区系类型、谱系分析、文字训诂、历史传承……而理科思维会更强调检测分析、逻辑推理、数据证明、开门见山……回顾我这些年取得的成果,大致涉及五个方面。一是与文物管理、保护工作相关;二是与古文字、古玺印研究整理相关;三是与黑曜岩研究相关;四是与科技考古、文物检测分析相关;五是与文博教学实践相关。

今年春节期间,中山大学的郑君雷教授告诉我,他之前向我咨询的“晋鲜卑率善目长”马纽铜印的相关情况,在他的论文《汉晋考古学材料中牧团组织识别的》中,被作为“职官印章”的重要证据使用。他说,这篇论文已在今年的《考古》杂志第1期上发表,非常感谢我的支持。这既让我意外,也让我

■ 编辑手记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一书,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献记载和专家研究成果,细梳我国战车战马的起源、发展、兴衰。再分别阐述战车的结构、战车战马装备及在战争中的运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全书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既呈现冷兵器时代战争形态的演变轨迹,亦透过车马文化折射文明进程中的军事逻辑与礼制内核,为读者开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提供了文化和战争的反思。

《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哲学,表明战车与战马作为军事技术与礼制文明的复合载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发展轨迹也深刻映照看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逻辑。战车战马始终作为文明演进的物质见证,承载着军事技术、礼制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多重信息。

我国古代战车战马的发展,从商周的兴起,到战国的鼎盛,再到秦汉的转型,最后至隋唐的成熟,明清的没落,书中对每一阶段介绍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战车战马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同时,通过战车战马的发展,重构古代军事装备的技术演变、社会环境对战车战马的影响。本书借助文物与文献,探寻一段文明演进的车辙马迹,让抽象的历史变得立体而鲜活生动。

战马与战车的起源

本书首先通过史前遗址中的考古发现揭示野马驯化的文明进程。从考古资料来看,人类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开始驯服马匹,我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仰光文化可能有最早驯化的马。商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突然大量出现,从兼有家养、食用功能逐步演变为驾车骑乘的对象。如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等商代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用于殉葬和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同时,与马有关的文字、玉器和青铜器文明也开始出现,亦标志着马文化的初步形成。

对于战车的起源,书中通过例举史实资料介绍了从苏美尔文明中的板轮车到轮辐马车的出现,轮辐式马拉战车的传播,再到马拉战车在中国出现的发展历程。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最早的车已经十分完备。从考古发现看,商代出现的轮辐式马拉战车有可能通过草原传入。尽管中国造车起源的具体节点仍需考古学新发现的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马车一经发明便成了我国古代战争和礼仪活动中的重要装备。同时,商周时期战车的技术水平以及独轭马车作战体系化运用,已形成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技术优势,尤以春秋时期“千乘之国”的战争规模达到历史峰值。

“祀”与“戎”:双重属性下的车马文明

商代,战车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车”与“衣、甲、弓”并列作为军事装备体系的核心构成。安阳小屯的车马坑出土了第一辆商代战车。对于我国早期的战车,书中还比较了中西马车系驾方式、早期战车结构细节,并具体介绍了商代早期用车的考古发现、无辐车轮和造车工具以及商周时期马器特点及战车各部分的结构。

从夏商之际到商朝覆灭的牧野之战,战车都是战场上的重要军事装备。书中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与车同葬的器物,加之文献佐证,详细介绍了车战中人员构成、车战的指挥系统、车战的兵器组合、车战的防护装备及战车特点等,揭示出战车在冷兵器时代初期的决定性作用。

西周时期,马车除在战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在古代祭祀、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功能,并成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不同等级墓葬的车马坑的位置、规模、车马器组合均遵循严格礼制。《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的“王之五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车马仪仗帛画》等均揭示车马在祭祀、礼仪等活动中的礼制象征功能。这种“寓礼于车”的传统,使车马成为维系宗法制度的物质载体。

“千乘之国”到“甲骑具装”

春秋战国时期,“千乘之国”的出现将车战推向顶峰,战车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由此可见战车的重要地位。此时车型进一步分化并逐渐专业化,出现了轻车、巢车、车屯车、广车、戎路等。此外,车马坑的设置、随葬车马器的组合,在各个诸侯国中也出现了差异。与此同时,青铜兵器和防御装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秦代战车在继承战国形制的基础上,出现明显的战术调整。书中介绍了秦始皇帝陵军阵中各军阵排列、人员功能、铠



甲类型、战车结构等。而草原骑战的传入动摇了车战的统治地位。秦汉以降,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展现了战车作为军阵核心的最后荣光,而汉武帝引进大宛汗血马、大兴马政,则为骑兵崛起奠定物质基础。杨家湾汉墓骑兵军阵、霍去病墓石雕等文物,见证了骑兵在辅助力量到战场主力的转变。

马具与甲骑具装正是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同步完善的,使单个骑兵的攻击力和防护力达到了极致。马具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曾侯乙墓曾出土过马用皮甲,尚属战车附属装备。汉代,骑兵装备逐渐发展,马具的雏形出现。东汉至三国时期,马具逐渐普及,但多为皮质,且数量较少,属于马具的早期形态。至东汉末年,马铠开始普及,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马铠。到十六国和南北朝这一时期,马具成为军队中较普遍的装备。隋代以后是马具发展成熟期。上马扣和高桥鞍、马镫的发明为中原骑马之风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辽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被发现到冯素弗墓马镫的初步成熟,标志着骑马用马具的完备,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外,书中还通过大量考古发现介绍了鲜卑等周边民族对马具的改进。

《大保护:文物科技与人文的交互对话》  
作者:刘爽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马具与甲骑具装正是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同步完善的,使单个骑兵的攻击力和防护力达到了极致。马具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曾侯乙墓曾出土过马用皮甲,尚属战车附属装备。汉代,骑兵装备逐渐发展,马具的雏形出现。东汉至三国时期,马具逐渐普及,但多为皮质,且数量较少,属于马具的早期形态。至东汉末年,马铠开始普及,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马铠。到十六国和南北朝这一时期,马具成为军队中较普遍的装备。隋代以后是马具发展成熟期。上马扣和高桥鞍、马镫的发明为中原骑马之风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辽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被发现到冯素弗墓马镫的初步成熟,标志着骑马用马具的完备,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外,书中还通过大量考古发现介绍了鲜卑等周边民族对马具的改进。

在用人护具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两当铠取代了西晋时期的袖铠,人和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装备具装铠也随之大量投入使用。朝阳十二台台砖厂88M1出土了我国第一副甲骑具装。甲骑具装从十六国时期至隋流行于300多年。魏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期吸取中原文化和域外技术的基础上,在军事技术上有了新的创造。河南邓州南朝彩色画像砖上的图像,马具结构完备,细节刻画清晰,可以看作这一时期具装铠的典型标本。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的具装马,其马身甲边缘装饰联珠纹,明显受到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工艺的影响,反映游牧文化与中原技术的交融。此外,书中列举的考古材料可以清晰看出马具和用人护具的发展变化。

从“金鞍细软弱马蹄”到“兵气销为日月光”

隋唐时期,骑战真正走向成熟,其标志是长矛大刀替代戟剑和轻装骑兵的出现。而甲骑具装逐渐从战场主力退化为仪仗使用。唐代的马,不仅用于作战,马球、舞马等娱乐活动还将马文化融入世俗生活。盛唐,骑马之风盛行,马更成为现实等级身份的象征。三花马、五花马的装饰艺术(如寄生、云珠)的发展,亦反映马具从实用向审美的延伸。唐代骑兵兴起并对周边产生影响。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大型雕塑,以及出土的各种陶马俑都是此时马文化的生动写照,亦彰显盛唐气象和文化融合之特色。

此时,马车虽退出战场,却在礼仪场合更加强调了其象征意义,车型亦向世俗化拓展。北宋以降,马具装从铁质转为皮质,折射军事技术重心的转移;明清火药兵器的普及,则使战车战马最终退出战争舞台。

本书通过考古发掘的微观研究,构建起中国古代军事文明演进的宏观图景。从殷墟车马坑的殉葬制度到唐代三彩马的艺术表达,再到战车战马退出战争的主舞台,战车战马的演变轨迹始终与技术革新、礼制建构和战争形态的变迁相关。回望历史,我们见证了战车战马在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同时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对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战争形式虽变,但其政治本质未改,技术进步需以和平利用为归依。从车马到现代武器,人类文明的真正强盛,始终源于对和平的珍视与智慧的追求。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  
作者:郭物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 卅载求真路

——从环境化学到文物保护的跨界坚守

刘爽

## 文明演进的车辙马迹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编后记

马晓雪